



ZHONGGUO DIANSHISHI

中国电视史

刘习良 主编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电视史 / 刘习良主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7.2

ISBN 978-7-5043-5035-0

I. 中... II. 刘... III. 电视史 - 中国 - 1958~2000
IV. G22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5558 号

中国电视史

主 编	刘习良
责任编辑	阎维峰
封面设计	张一山
责任校对	张莲芳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人民印刷厂
装 订	涿州市新华装订厂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560 (千)字
印 张	33
插 页	8 (面)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43-5035-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编 委 会

主 编 刘习良

副主编 张 聪 赵德全 陈富清

编 委 李兴国 哈艳秋 叶凤英

赵凤翔 李献文

了却了一桩心愿

(代序)

刘习良

历时七年，八易其稿，这部《中国电视史》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回想这些年来，近七十人参与查阅资料、访问、写作、统稿、调整、补充、修改、审订，群策群力，终成正果，可见编写史书之难！

中学时代，受业师影响，我对历史课程产生过浓厚兴趣。报考大学时，也曾填报过历史专业。最终还是服从统一分配，学习了西班牙语。

经过十余年的学校教育、四十多年的社会教育，我逐渐懂得了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离不开研究历史。史学属于基础性研究，研究任何一种事物，首先要占有丰富的材料。所谓“材料”，无外是历史和现状两部分，而现状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不了解历史，就无从知道现状形成的原因，更谈不上对现状作出准确的评价以及预测未来的发展走向。可以这样说，研究历史是研究任何一门学问的基础，学习语言是这样，研究广播电视也是如此，必须对历史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1997年4月，我到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任常务副会长。中广学会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广播电视学术研究。1990年9月，学会的重点课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出版，为我国广播电视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一届理事会期间，除了短线课题以外，还应该完成哪些长线课题呢？思索了一段时间，萌生了编写“一史一论”的念头。和同事们交换意见，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

“一论”，就是《中国广播电视新论》，已经在2004年8月出版，作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术研究系列丛书”的首卷。“一史”，就是《中国电视史》，由于编写中的一些问题，迟至今日才得以面世。

电视史研究的对象是电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事件、重大决策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人物，从历史轨迹中探索我国电视的发展规律。单靠学会本部成员，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发动社会各界研究力量参与编写，同时，还要继承我国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努力补充知识的缺欠，积累编史的经验。

我国史学研究历来有“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编《史记》，追求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为的是“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看来，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摸索为政要义，为现实服务，而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我国史学家还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是什么，就说什么；是怎么样，就说怎么样；特别是不为贤者讳，优点讲充分，缺点也不避讳。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央倡导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地追述历史，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即是我们编写《中国电视史》的两条基本原则。

2001年，总局领导批准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常务副主编。从当年3月到7月，审读了全部书稿，和编辑部的同事们多次交换补充和修改意见。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明确了编写史书的三重目的，即：“存史、资政、育人”。对我来说，这段经历至关重要，不仅积累了编写史书的经验，更进一步明确了编写史书的目的。

“存史”是我们编写本书的直接目的。既是史书，首要的是史料翔实，大事不遗漏，细节不失实。虽然我国电视只有四十余年的历史，但是早年的原始资料丢失不少，加上事过境迁，当事人仅凭记忆，难以准确描述过往事件的细节。在编写、审读过程中，发现有些事件发生的年代、时日，有些栏目、节目的名称在不同版本的史书、大事记中互有出入。为了准确起见，尽量找到当事人反复核对。一时弄不清楚的，宁可暂做模糊处理，留待将来查找。

“资政”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刻意追求。广播电视不是孤立的事业，而是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离开社会背景，无法讲清电视业的起伏变化的原因。因此，在原稿的基础上，增加了一节，专门交代时代背景以及在各种历史背

景下作出的重大决策,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民主、科学决策为电视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反之,决策失误必然造成令人痛心的损失。本书记录下历史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今日的决策可以从吸取很多有益的东西。

“育人”是我们编写本书的终极目标。电视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起步阶段,困难重重,电视人因陋就简,艰苦创业。“文革”时期,电视业饱受摧残,电视人竭尽全力,尽量减少损失,推动技术进步。20世纪80年代,电视人积极参与拨乱反正,坚持“自己走路”,迎来90年代电视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变化,并以昂扬向上的精神应对国际强势媒体的挑战。为了坚守“阵地”,电视人努力改进节目,满足观众需求。本书记录下几代电视人为后来者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2002年11月,因心脏不适,住院检查。利用空隙时间,开始通读《中国电视史》书稿。至去年6月,先后通读三遍。最后一遍读毕,掩卷长思,一方面,为即将完成一项大工程,了却一桩心愿感到松了一口气;另一方面,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想目的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内心里依然惴惴不安。

好在任何一本史书都是研究历史的阶段性成果,绝非研究的终结。书籍出版后,就成为公众读物。作为本书主编,诚心静候有兴趣阅读本书的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们在史学研究上提高一步。

2006年12月30日

于知还室

目 录

第一篇 艰苦创业(1958—1966年)

第一章 历史背景及重大决策 /3

第一节 历史背景 /3

第二节 重大决策 /6

第二章 中国电视事业的产生 /11

第一节 世界电视事业的发展及中国办电视的设想 /11

第二节 北京电视台的成立 /16

第三节 早期成立的地方电视台 /18

第四节 早期的电视人 /23

第五节 中国早期电视的特点 /29

第三章 早期电视的节目构成与基本形态 /33

第一节 新闻宣传节目 /33

第二节 知识教育节目 /41

第三节 文化娱乐节目 /46

第四章 早期电视的技术与管理 /55

第一节 早期电视的技术设备与基础设施 /55

第二节 早期电视节目的制作与播出 /58

第三节 早期电视的管理与组织结构 /66

第二篇 曲折发展(1966—1976年)

第一章 历史背景及重大决策 /73

第一节 历史背景 /73

第二节 重大决策 /75

第二章 “文革”时期的电视 /78

第一节 “文革”中的电视台 /78

第二节 电视宣传“文革”中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 /86

第三节 “文革”对电视的影响 /97

第三章 技术的发展和全国电视网的建立 /116

第一节 彩色电视的研制和节目制播系统的改革 /116

第二节 节目传输的发展与全国电视网的建立 /121

第三篇 成长壮大(1976—1991年)

第一章 历史背景及重大决策 /127

第一节 历史背景 /127

第二节 重大决策 /132

第二章 过渡时期的中国电视 /138

第一节 新闻事业在徘徊中前进 /138

第二节 电视事业的恢复发展 /140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电视 /154

第一节 电影和电视的合与分 /155

第二节 中国电视走自己的路 /162

第四章 转型期的中国电视(上) /189

第一节 电视新闻节目全面改革 /189

第二节 电视节目增强政治透明度 /204

第三节 经济节目成长壮大 /209

- 第四节 电视纪录片日益繁荣 /211
- 第五节 电视教育节目走进人们的生活 /215
- 第六节 电视传播体育活动快速发展 /223
- 第五章 转型期的中国电视 (下) /231
 - 第一节 百姓的文化大餐: 春节晚会 /231
 - 第二节 电视剧走向成熟 /235
 - 第三节 电视节目中服务意识日益增强 /238
 - 第四节 对外交流与合作更加频繁 /247
 - 第五节 城市电视台的崛起 /255
- 第六章 电视事业发展的推动器 /260
 - 第一节 对电视有了理性化的认识 /260
 - 第二节 观众反馈受到重视 /267
 - 第三节 广告成为重要支柱 /270
 - 第四节 电视队伍的思想 and 业务建设 /275
 - 第五节 电视技术和传输覆盖网的完善 /282
 - 第六节 电视管理体制改革探索 /287

第四篇 飞速发展 (1992—2000年)

- 第一章 历史背景及重大决策 /299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299
 - 第二节 重大决策 /301
- 第二章 调整节目结构, 开办专业频道
提高电视宣传的整体水平 /311
 - 第一节 新闻类节目——突破性变化 /311
 - 第二节 电视新闻评论——扬起自己的旗帜 /327
 - 第三节 电视纪录片的风格趋向多样化 /332
 - 第四节 经济报道的生活化和理性化 /339

- 第五节 社教节目的专题化、多样化、对象化 /348
- 第六节 体育节目成为收视热点 /353
- 第七节 谈话节目方兴未艾 /360
- 第八节 丰富多彩的电视文艺及娱乐节目 /368
- 第九节 走向成熟的中国电视剧 /379
- 第十节 走向世界的电视对外宣传 /385
- 第三章 电视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 /392
 - 第一节 有线电视——区域化网络形成 /393
 - 第二节 卫星电视——空间网络建立 /397
 - 第三节 网络电视——拓展新的生存空间 /404
- 第四章 电视观念走向成熟 /414
 - 第一节 五种新观念的演进 /414
 - 第二节 节目、栏目、频道、品牌 /425
 - 第三节 制作人—制片人—策划人 /436
 - 第四节 制播合一和制播分离 /442

附 录

- 附录一 香港、澳门、台湾的电视事业 /453
 - 第一节 香港的电视事业和电视新闻 /453
 - 第二节 澳门的电视事业和电视新闻 /462
 - 第三节 台湾的电视事业和电视新闻 /466
- 附录二 中国电视大事记 (1958—2000年) /477
- 后 记 /515

第一篇

艰苦创业

iiankuchuanave

第一章

历史背景及重大决策

1958年至1966年是中国电视事业的起步阶段。正如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在它刚刚问世的这段时间里，注定呈现一种不太稳定的状态。其与意识形态的紧密关联及需要较大经费投入的特点，使它不能不受当时国家宏观政治经济政策的制约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它需要与外界环境进行长期不断的磨合，需要大量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对客观发展规律的不懈探索。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电视事业还很弱小：除中央电视台（前身称“北京电视台”）和有限的几个大城市的电视台外，一些地方电视台因受三年经济困难和国家压缩经济规模的影响，几经起落；受急躁冒进和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在宣传中出现过严重的失误和偏差。这无疑使它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充满坎坷，但毕竟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一节 历史背景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7年到1966年，我国转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国电视事业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在这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在这两大问题上既有正确的决策，又有严重的失误。同时，政治战线的斗争和经济战线上的成就与失误相互交织，使探索道路呈现得极为曲折。但是，社会总趋势是前进的，国家取得的成就也是辉煌的。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56

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起来了，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逐渐收到成效，教育质量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以电子工业为例：旧中国的电子工业基本上是一个空白，仅有十几个很小的无线和有线通讯修配、电讯器材工厂。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电子工业从业人员只有四千多人，靠从外国进口元器件搞一点收音机和电台的装配维修。1959年到1965年，我国电子工业从小到大，从修配到制造，从仿制到自行设计，逐步地发展起来。1965年，电子工业完成新产品定型项目762项，已能生产广播电视发射设备、电视中心设备、收音机、电视机等。电子元器件除少数电子样管需从国外购买外，已基本立足国内。

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真探索。接着，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国内形势，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是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1957年的经济工作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正是认真执行党的八大正确方针的结果。

1957年，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也是符合党的八大精神的。整风运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知识分子和民主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和响应，但也为极少数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借机发难提供了机会。为了迎击敌人的进攻，中共中央于6月8日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此后，全国整风迅速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并一直持续到1958年夏季才结束。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反右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达55万

余人，误伤了一大批同志和朋友，其中很多是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长期受到委屈和压制，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也使国家和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发生，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论断，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错误的根源。

1958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党中央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却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误。在政治上，它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支持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在经济上，它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召开）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所发生的严重困难，党和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牺牲和损失，部分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大批撕毁合同，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造成的结果。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历史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党的八大以后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大

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全党和全国人民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以及为“反右倾”运动中部分被错误批判的同志平反，给被错划的“右派分子”摘帽等经济和政治措施的实施，对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农业生产1962年开始恢复，工业生产从1963年开始恢复。调整时期，还对石油、化纤等一些急需的工业部门进行了充实，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趋于协调。降低了积累率，保证了人民生活需要。市场供应情况显著好转，物价渐趋稳定。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对外贸易有较大增长。文化教育和体育卫生事业也有新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此外，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总而言之，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党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因而对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不可能彻底纠正，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对某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观点，也没有能够进行认真的清理。1962年，毛泽东更是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加以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中苏论战公开化后，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毛泽东担心党内出现苏联的代言人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要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这些错误虽然在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但无疑成为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总之，这一时期我国全体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热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与探索，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尽管其间政治形势跌宕起伏，经济发展颇显曲折，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向前迈进的，取得的成就是令世人瞩目、也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第二节 重大决策

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电视台，广播事业局早在1953年即派人出国学习电视技术。1955年2月，向国务院提出建台计划。对此，周恩来总理批示：“将此事一并列入文教五年计划讨论。”1956年5月28日，刘少奇听取中央广播事业局

汇报工作，在讨论试办电视问题时，刘少奇指示，可先搞黑白电视，但重点应该发展彩色电视；电视发射机和接收机最好自己生产；为了丰富电视节目并适合电视技术的需要，建议广播局建立自己的剧院。1957年8月17日，广播局正式成立北京电视实验台筹备处，为电视台的建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1958年4月29日，广播局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报告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拟于5月1日开始实验播出，获中央批准。经过四个月的实践，于当年9月2日转为正式播出，新中国电视事业由此正式诞生。

从1958年5月1日晚7时播出起，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止，广播电视系统共召开过五次全国性的工作会议。由于当时广播电视系统在事业规划和宣传方面的管理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模式，因此，了解这些会议的内容，将有助于我们清楚地看到当时的一些决策对事业发展和宣传工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1958年4月7日至18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京召开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为讨论广播工作“大跃进”的方针、目的以及怎样实现多、快、好、省的问题。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钱俊瑞到会讲话，局长梅益作了题为《政治是广播工作大跃进的统帅》的总结发言。

这次会议认为“广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政治是广播工作大跃进的统帅”。要多、快、好、省地办节目，办事业，为教育和团结广大人民，为保卫祖国、灭资兴无、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

会议提出宣传政治、普及知识、文化娱乐是广播的三大任务，并提出文艺节目的“三三制”，即传统、现代及配合当前中心工作和运动的作品各占三分之一，今二古一，中七外三。具体运用时可灵活一些。

会议强调要改进文风，认为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不仅是思想立场问题，而且是思想方法问题，同时又是表现方法问题。

多、快、好、省地办事业首先要普及农村广播网，其次要按照需要和可能发展发射电力和其他设备。

会议认为“广播工作大跃进的关键在于干部”，强调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广播工作队伍。

这次会议确定的广播工作大跃进的方针，与其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精神是一致的。会后，全国各地广播局（台）根据会议精神，纷纷制定各自的“大跃进”规划，并根据“政治就位，灵魂附体”的精神组织“大跃进”的广播宣传。“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成为当时广为传播的口号，召开各种广播